

前綫文艺丛书

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

政治部宣传部编



生命的火花

SHENGMING DE HUOHUA



前綫文艺丛书

生命的火花

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
政治部宣传部编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前线文艺丛书
生 命 的 火 花
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

江苏含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証出○○四号
江苏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2/3 字数 49,000
一九五九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八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印数 1—7,000

目 录

生命的火花	林維先(1)
常青的十字岭	李 一(19)
共产主义英雄陈金合	张 明(26)
战友和爱人	邓宇蓝(30)
我们在微山湖上	李黑林(40)
保卫长江大堤	吴华存(46)
生命	高成孝(52)
鞋	聂英杰(55)
王庄回忆	楊守来(63)
将军和他的“板凳拳”	王得一(72)
一首没有完成的诗	廖泽滨(78)
温暖的寒夜	陆志高(82)
班长和新兵	蔣錫鉸(86)
班长的婚事	陶 允(88)
編后	(92)

生命的火花

林維先

我的家乡——安徽金寨县，是个老区。远在1924年，董必武同志和陈潭秋、萧楚女等同志就在那里领导农民运动。1927年已经出现了农协会；党领导广大农民掀起减租、减息的斗争。1928年红军来了，一连串的事情教育了我。一年后，我参加了红军，加入了共青团，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，但印象之深，至今犹历历在目。

回忆

1927年，我十六岁，一不识字，二不懂世事，标标准准是个地里娃。那年头军阀当道，土匪如毛，搞得鸡犬不宁。尤其是李老英那股土匪，足有上千号人，老百姓暗地里都叫他们为閻王，一听到李老英那帮“拿枪的”来了，就扶老携幼，挑担背箩的逃上山去避难。

这一天，我正跟着父亲在地里耙土块，忽听到东头发出一阵阵呜呜声，随着声音涌来一伙人，一边跑一边喊着：“拿枪

的来了！”我赶忙放下锄头跟着爹就跑，由于急促，我的一件袄也丢在田畔上。

我們一口气奔上山崗，找了一个安身的地方，一直等到天黑。可奇怪，今天山下倒很宁靜，我想出洞去探探，又怕李老英那股强盜施計，所以沒敢出去。

好容易在黑黝黝的山洞里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，天一明，实在憋不住了，我第一个偷偷地溜出洞口，往山下瞧去，可怪，山下沒有拿枪的，一堆堆的乡邻象在談論什么。我們心里很詫异，急急忙忙往山下跑，一路上見到回去的人可不少，跑到轉角上，人越来越多，挤得密不通风，我怀着好奇心，一股劲的往里钻，費了好大劲才到了里边，一看就惊住了：我面前的那棵大树下，躺着三个肥头大耳的尸体，正是蔡家畝三个赫赫有名的財董。財董怎么会躺在这儿呢？我望望周圍站着的人們，人們脸上現出各种不同的表情，有高兴的，有表示惊奇的，有的正指手划脚地談論着这件事。我旁边正站着一高一矮的两个人，那高个子嘖了嘖嘴，伸手点了点尸体說：“我看准是和閻王鬧翻了，也許少了錢，狗咬狗。”

“不，”那个矮的說：“要杀也不会三个一齐干，李老英盼什么着。”他忽然放低声音：“我看准是‘黑杀党’，是啊，准是他們。听說六安、皖西都搞过那么一回，这‘黑杀党’还专治財董哩。”

“‘黑杀党’专治财董。”我的脑子里盘旋着一个又一个的问题，他们是好是坏，他们在哪里？我再想探听，那矮汉已经钻出了人堆。

“问问看，也许是一支专打不平的部队？”好奇心促使着我，我跟着钻出人群，追上那矮汉：“你说的‘黑杀党’在哪？他们真是好人？”那矮汉给我问得一楞，停了一下，他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近在眼前，远在天边，算是好人也不错。”说完他嘿嘿地笑了。

我这才知道世界上拿枪的并不一样，还有一种拿枪的是专治富人的。可是，他们在哪里？此后，只要别人一提“红党”“黑党”，我就竖起耳朵听着，竭力探求着有关“黑杀党”的谜。

暴 动

蔡家贩土豪被杀后，过了三个月，1926年的春天，金寨县、丁家埠、李家集一带终于掀开了农民起义的幕布。

三月，在皖西天气还很冷，但在穷人心里却燃起了熊熊烈火，大伙下田少了，村里也常常见到一些素不相识的人。我父亲，这个素来被称为老实人的老头，也活跃起来了，到我家里来找他的人很多。

一天，我父亲打发我到离家十几里的姊姊家里去。就在那天半夜，睡梦中听到一阵锣鼓声，我爬起来往外看，

只見丁家埠那頭紅光閃亮了半边天，人聲槍聲混成一片。我不知出了什么事，想回去看看，可是姊姊說啥也不答應。天剛亮，我連早飯也沒吃，就急着趕回家去。一路上路過的人群都在談論着，說是昨夜李家集、丁家埠出事了，說什麼農民暴動了……我走進村里，看到人們一個個嘻笑顏開，連走路也輕鬆了。認識我的人，興奮地告訴我：昨夜農民聯合起來的隊伍，衝進民團局子，殺了土豪劣紳，把民團的槍也繳了。我高興得跳起來，真後悔沒能參加這個真够勁的暴動。跑回家里父親也喜孜孜地與我講述了參加暴動的經過。

暴動是抗稅引起的。那夜燈火通明，農民拿着自己的鋤頭、犁耙、紅纓槍、梭標，衝向街頭，殺進民團局子里，土豪劣紳吓傻了，乖乖地繳了槍。農民們分了地主的糧食，燒毀了田契、借據。窮人們一邊走還一邊打鑼敲鼓，高呼口號：“打倒土豪劣紳！打倒貪官污吏！”“有飯大家吃！有田大家種！”“沒收土地，分給農民！”“建立窮人自己的政權！”

父親說完，眯着眼睛光笑，臉上閃露着充滿希望的愉快，我第一次看到他這樣高興。

“那幫帶頭的人呢？”我着急地問，不由得又想起了那個“黑殺黨”，心里忽然亮堂起來。但是父親沒有再說下去，停了好一會，他走近我，說：“他們好是好，可是怕他們

待不久。你別亂跑！”父親不放心我，但是，我從來沒有見過這幫好人，怎肯放過這個機會呢？我下決心去看看，也許這些人長着三頭六臂，个个是身長六尺的大漢。

紅 軍

我偷偷地走出了家門，迎面見到一個大兵，那漢子不太高，脖項纏根紅帶，他朝我光點頭笑。說老實話，他尽管對我笑，可我还是害怕，我想起過去閻王那伙拿槍的，瞪着眼，杀气騰騰的。我不敢走近他，不相信這大兵就是我父親說的那些人。我閃過一邊，註那大兵走過去。他穩穩地邁動脚步，連別人家場角上放的东西也不看一眼。

我跑到村西几家老鄉家里，那里也有兩個纏紅領帶的大兵，周圍圍着一堆人，我也湊近看看，只見一個老鄉手里拿着錢，在和大兵推來推去。我問站在我旁邊的老鄉，說是大兵叫紅軍，是共产党的隊伍，方才吃了一碗茶，硬要付錢，老鄉不收他不依。

喝茶付錢，这可怪！別說見啦，連听也从沒听說過。我看他們爭了許久，最后还是那老鄉輸了，收下了錢。這一來，我的胆子也壯了，插上去問了几句話，這一問可打開了話匣子，他講什么紅軍打富濟貧，打土豪，殺劣紳，政治平等……有人叫他事務長，我也不知道事務長是做啥的。他們忙着買這買那，件件買賣都是和和氣氣的，我心

里捉摸：他們光說紅軍，有時也提共產黨，可“黑殺黨”三個字他們沒說半個，也許他們就是那伙殺蔡家畝“財董”的“黑殺黨”，他們准是好人。我心里越來越明白，我整天沒事就跟着他們轉。他們在村里住了幾天，我差不多天天要抽空去聊一會，很願意在他們那里，幫他們做點什麼。

過了兩天，我上姊姊家里去辦事，在姊姊家里又遇見那個套紅領帶的事務長，他正在一間小屋旁為几籃子菜发愁。我一看可高興了，他准是缺人，替他們做些事的机会來了。那時我年紀輕，個儿又長得高，一挑百十斤，一點不覺得什麼。我刚想開口，姊夫正叫我：“弟啊，你幫紅軍挑菜去。”我急忙挑起担子就走。來回几十里，我挑得又高興又起勁，一路上事務長夸奖我身體好，跑得快，還問我家里有些什麼人，懂不懂革命。挑完菜，我刚要走，他硬把三塊銀洋塞到我的手里。這我怎肯依他，給軍隊挑菜還要錢，哪有這件事，何況我又是自願的。我丟下錢，拔腿就逃。他追上來，說好說歹定要我拿走，還說：我不收就是要他“破壞紅軍紀律”。我只好拿着三塊銀洋回到家里，把這天看到的事對父親說了，臨睡時父親叮囑我：“你長大了，就去當紅軍，和他們一起干，要做紅軍那樣給旁人出氣的好人。”

革命

七月，国民党反动军队向大别山“进剿”，红军为了保存力量与主力汇合，从金寨、丁家埠、李家集撤走了。

紅軍一走，敵人又猖狂起來。惡霸、地主、土匪、壞蛋都回來了。第一件事就是捉人殺人，企圖撲滅革命的火焰。在敵人回來後不到三天，我父親也被抓去了。在那些日子裡，東田鋪給弄得鬼哭神嚎。後來，花了好大勁，請人把父親保了出來。我們用門板把他抬回來時，受盡酷刑的父親已是奄奄一息，不到一個月就與世長辭了。父親臨死前，一隻手抓著母親，一隻手撫著我的頭頂說：“孩子，長大了給我報仇，要做個有志氣的人。”說完眼淚水簌簌地從臉頰上流下來。

“我一定要报仇!”我跪在父亲面前宣誓。

父亲一死，我就要去找红军，可是红军走了，往哪儿去找呢？我只能在母亲的劝慰下，抑住怒火，含着眼泪，勉强的在敌人的皮鞭下过着奴隶的生活，等待复仇的机会。

好容易熬过了四十天，传来红军从湖北回来了的好消息。我放下活，一口气跑到路口，逢人就說，仿佛这一說心里就舒坦些。红军真的回来了，他们回来时打了許多胜仗，一路上解放了鄂、豫、皖边沿的許多乡鎮。农民

們燒水獻茶，拿出了自己僅有的一些干糧送給他們。

紅軍一來又熱鬧了。搞農會又搞赤衛隊。我姊夫還當了赤衛隊長。那天他到我家來，問我：“弟啊，你為什麼不參加活動？”我說：“想去，不知怎樣干？”我姊夫說：“來，跟我去。”就這樣我跟着他參加了第一次活動。

那活動是個追悼會。追悼會在南溪舉行，規模很大，有成百上千的人，一連開了好幾天，農民們一個個上台訴苦，追述四十天里受害經過，烈士家屬更加激昂悲憤。大家都為死去的烈士難過，有人在會上寫了血書，發誓要為烈士報仇。我心里也充滿了對敵人的仇恨，暗暗打定主意——參加革命，跟紅軍走。

開完會，我跟着姊夫走回家去。半路上，聽到有人叫我，我回頭一看，原來是表兄，他穿着和紅軍一模一樣的衣服，姊夫告訴我，他已經是一個紅軍連里的連長了。我羨慕他，緊緊地跟着他，心里有許多話想說，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事，于是就問：“姊夫當了赤衛隊長，你呢？”

“我，沒什麼。”停了好一回，我不好意思地說。表兄又說，我參加紅軍年紀太小，還是加入少先隊。“對，革命，加入少先隊。”我忽然被他提醒了，我告訴他們馬上加入少先隊，一定革命。當夜我去找村蘇維埃的負責人，他答應了，並且要我明天晚上開會。

第二天晚上，幾十個大孩子擠在一間小屋裡，村蘇維

挨的負責人在豆油灯下給我們講了話，然後一個套着紅領帶的陌生小伙子，宣讀第一批少先隊員的名單。豆油灯的火苗子給風吹得忽閃忽閃的，我們的心里也象火苗一樣燒得正歡。每讀出一個名字時，場上就有人站起來叫“到”。才開始叫第一個名字時，我就緊張起來，不安的坐在凳上。突然聽到喊“林維先”，我應了一聲“到”，連說帶跳的站了起來，站在那裏呆住了，不知下一步該怎么做。待別人拉我的衣角時，才知道我應該坐下了。

那夜，我很激動，偷偷地跑到父親睡過的床前哭了，要是父親活着該多好，我可以大聲地告訴他老人家：“我參加革命了，我加入了少先隊，我學着做好人了。”

上 山

加入了少先隊，一切都有勁了。我和少先隊的伙伴們一起參加生產，一起拿着木棍站崗放哨，有時我們還做些宣傳動員工作。後來我弄到一枝土槍，你可別小看那家伙，背上它真夠勁，我真喜歡它，我背着它押過土豪，送過信，保衛過鄉親下田。我們少先隊開會，組織生活過得很嚴，小隊長、召集人都是民主選舉的，我們隊員唯一的標幟是臂上那塊紅袖章，別看那一塊紅布，挂上它可真神氣。

1929年初，紅軍外綫出擊時，鄂、豫、皖蘇區又遭到了

敌人残酷的破坏。为着保存革命力量，对付敌人可能的大屠杀，在部队撤离的同时，赤卫队员也撤走了。我们少先队员含着眼泪送别他们，组织宣传队，护送伤病员，帮助大人筹粮，掩护物资，整整忙了二夜。

红军一走，敌人跟着就来了。敌人找不到赤卫队员就大肆逮捕少先队员，他们用刀子威胁我们这些受过共产党教育、受过红军恩惠的少先队员，我们怎么会向他们低头！连夜召开队员会议，大家都认识到这次斗争是对我们一个严重的考验，千苦万苦，千难万难，不能投降，不能出卖自己人！我们宣誓：“紧紧团结一起，逃到山里去。”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，我们还规定了：分散活动，定期联络。我们脱下臂上的红袖章，把它揣在怀里，每人带上一部分干粮，在乡邻们的帮助下，一夜间全部逃到山上。我当时躲猫猫岭，那岭最高，树很密，山路又凹凸不平，整整爬了一夜。到山顶拣了个山洞，里边铺上树叶，白天躲山洞里，晚上偷偷出来活动。过了几天，敌人开始恶毒的封山，搜山，这一下把我们的计划打乱了，很多队员走散了，有的被捕了，山下又不能接济干粮，我们完全陷入绝境。一、二月的皖西格外冷，老天又偏偏刮风下雪，我们不但要和敌人作斗争，而且还要和饥饿、寒冷作斗争。冷了，就团着身子；饿了，就摘山果野菜，喝泉水，啃树皮，几乎过着与原始人一样的生活。纵然如此，我们这些怀里揣着

紅袖章的孩子，个个有骨气，没有一个投降的。这样熬过三十八天野人似的生活后，紅軍终于回来了。当山下的老乡带着紅軍来山上寻找我們时，我們兴奋得流下眼泪，从洞里出来，插起我們的小紅旗，用饿得沒有力气的手，从怀里拿出紅袖章……我們不仅有了紅旗，紅袖章，我們还有一颗火热的紅色的心。

下了山，我們又拿起大枪站崗，放哨，掩护老乡种庄稼，帮着赤卫队员分田地，打土豪。此后，再也沒有人說我們小了，因为他們知道我們人小志气不小。

入 伍

当了一年少先队员，我又参加了紅軍，那是一九二九年的冬天，算算年紀是十九岁。

那時間，苏区巩固了，政府动员苏区人民报名参加紅軍，有志气的都去了，我在会上也报了名。被編在独立旅当挑夫。

我年紀輕，个儿高，力气大，干这工作挺滿意。入伍不久部队接連行軍，我挑上一二百斤东西，跟着营长跑。过了大约一个星期，营长对我說：“小林，要打仗了，你可別怕。”我不服气地說：“我沒見過打仗，可‘怕’这个字我想也沒想过。”上火綫前，营长給我一面大旗，叫我打着它跟着他跑，我原想拿枪杀敌人，但营长說扛旗重要，我就

依了。

我扛着那面大旗一个劲儿地跟着他跑，敌人的子弹嗵嗵地打过来，真密，打得树丫叉叉都落下来了，我没打过仗，也没见过这場面，真給弄糊涂了。走着走着，我越发奇怪，于是問营长：“营长，这树丫丫为什么老往下掉？”营长一听笑了，他往我身上一拍，說：“傻瓜，这是子弹打下来的。”唔！子弹，这要多少子弹？我第一次知道敌人竟用这么多子弹对付我們。营长告訴我，打仗不是鬧着玩的，敌人是最凶恶不过的，当兵的头上常常飞过子弹，可子弹不打胆大勇敢的人，它老跟着胆小鬼。我記着营长的話，第一次上陣我就壮着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营长还告訴我許許多多有关打仗的常識，譬如說，手榴弹来时該怎么办？臥倒还是后退？什么子弹打出来发什么声音，怎样用听觉測量子弹在空中飞跃的高度和射击距离等。我們的营长真好，至今我还想起他。

在独立旅待了不久，我因为脚上患关节炎被送到皖东总医院养病，后来又在医院里警卫排当战士。医院里住滿了伤员，人少事多，我有时抽空上去帮帮忙。我奇怪的是：那些伤得最重的，病势最凶的总是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員。有一次，前方抬下来一批伤员，其中一个已經接近死亡了；他伤在头部，伤势很凶，我走近去，想为他做些什么，他吃力地动着嘴唇，嘴里低低呻吟着，突然，在他身上

我发现一个銅扣子(那时候軍隊里的一种临时党証。平时共产党员不把自己的身分告訴別人,一到冲鋒陷陣,战士们就挂上它,表示自己是党员,对党忠誠。)我好奇地指着它,別人告訴我,那是党証,証明他是共产党员。我想:为什么党员不怕死,为什么最苦最困难的地方总是共产党员上去。我联想起了父亲一句話:长大了当紅軍和他們一起干,要做紅軍那样給穷人出气的人。于是我又想起父亲的死,想起我跑在他床前的复仇宣誓。“当共产党员,当共青团員,我要做个和他們一样吃苦在先,不怕死的人!”我暗暗地下了决心,并且把我的心愿还偷偷地告訴了我們的排长——我們这个排唯一的共产党员張經武同志。張經武同志是个和蔼可亲而做事又极严格的人,打从那次起,他常常找我談話。有一次,他又来找我談話,忽然問我:“你知道我們为什么要革命?”

“打土豪嘛!”我連想都沒有想就回答出来。因为我从来就知道这一点:革命嘛就是打土豪,分田地。他听完我的話微微地笑笑,然后又問:“那你知道打土豪又为什么?紅軍里什么人最光荣?”这下可把我难住了,我只好回答:“不知道。”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談話中,我又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。从此,我就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种最光荣的人,那就是为別人而活着的人,他們的名字就是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員。